

“四皓”、“南山”与陶渊明

刘 翠 刘 石

文章讨论“商山四皓”和“南山四皓”二称在古代文献中流传和并行的情况，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解释二称并行的原因，对四皓隐居地的具体所在及其真实性问题发表看法，指出“四皓”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后人不断建构的一个文化符号，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，着重辨析陶渊明名句“悠然见南山”与“南山四皓”的故事无涉，仍当以理解为实写和表现闲远之趣为是，并由此就如何全面、准确地把握陶诗以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提出己见。

本文考辨“四皓”隐居地名及其与陶渊明诗句“悠然见南山”的关系，并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，就如何全面、辩证地理解陶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四皓”是历史上一组有名的人物，其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那就是汉帝刘邦欲废吕后所生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。留侯张良为吕后支招：有四位老人，因上慢侮人，逃匿山中，义不为汉臣。若能卑辞安车，请其出山，是一助也。后果如所计。此四位老人即东园公、甬里先生、绮里季、夏黄公，年皆八十有余，须眉皓白^①。但其所逃之山的山名商山和“四皓”的统称，在正史中要到一百多年后东汉班固撰写的《汉书》才出现，那就是高帝“求聘四皓”^②，又“此四人者，当秦之世，避而入商雒深山，以待天下之定也”^③。至于“商山四皓”联缀成词，则大约以三国魏曹植的《商山四皓赞》^④为较早。

但“四皓”所隐之地，“商山”之外，还有“南山”一说，且其在载籍中出现的时间，甚至还较前者为早，此即西汉扬雄《解嘲》所云：“四皓采荣于南山。”^⑤荣者花也，或谓名声。不特此也，“南山四皓”成词，似亦早于“商山四皓”。宋陈彭年《广韵·十六蒸》“应”条下：“汉有应曜，隐于淮阳山中，与四皓俱征。曜独不至，时人语之曰：‘南山四皓，不如淮阳一老。’”^⑥据此，则“四皓”

当时就有称“南山四皓”的了。又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“颀”字条:“南山四颀,白首人也。”^⑦颀,白貌。与较早提出“商山四皓”的曹植同时的孔融,亦用过“南山四皓”的说法^⑧。那么“商山四皓”与“南山四皓”二称究竟何者为是呢?查唐李泰《括地志》:“终南山……一名南山。”^⑨可知南山即终南山也。又考宋程大昌《雍录》:“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,西起秦陇,东彻蓝田,凡雍、岐、郿、鄠、长安、万年,相去且八百里,而连绵峙据其南者,皆此之一山也。”^⑩唐柳宗元《终南山祠堂碑》:“惟终南据天之中,在都之南,西至于褒、斜,又西至于陇首,以临于戎。东至于商颜,又东至于太华,以距于关。”^⑪按《汉书》“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”句,唐颜师古注:“商颜,商山之颜也。谓之颜者,譬人之颜额也,亦犹山领象人之颈领。”^⑫合此数条,又可知终南山绵延八百里,商山为其支阜^⑬。是则称“商山四皓”者为详言之,称“南山四皓”者乃统言之。“四皓”所隐商山的具体位置,史书及舆地书中亦有记载。《汉书》“避而入商雒深山”句,颜师古注:“即今之商州商雒县山也。”^⑭《水经注》卷二:“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,东南过其县南”句,北魏酈道元注:“县故属京兆,晋分为郡。《地道记》曰:‘郡在洛上,故以为名。’……楚水注之,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,昔四皓隐于楚山,即此山也。其水两源,合舍于四皓庙东。”杨守敬疏:“盛弘之《荆州记》:‘上洛县有商山,其地险阻,林壑深邃,四皓隐焉。’旧志,山在商州东八十里。《水经注》谓即州西南之楚山,非也……《地形志》:‘上洛县有四皓祠。’《一统志》:‘四皓庙在商州西金鸡原。’”^⑮可知商山之具体所在,古人的说法早不能完全一致,但大体上的位置还是清楚的,即在汉时的上洛,今陕西东南部商洛市属地。商洛市辖区内今尚存有多处“四皓”遗迹,如商州区南高车山、西金鸡原均有四皓庙,丹凤县城西商镇镇有四皓墓,洛南县城西南有因四皓山而得名的四皓乡,等等。

关于这些遗迹的真伪问题,或许可以这么来看:(一)商山虽为终南山之支阜,但其自身也是一条山脉。据商洛市商州区博物馆雷文汉介绍,它西起商州区南的流峪口,并丹江东下,止丹凤县东,绵延亦达百余里。雷氏并且认为,商山既如此之广袤,“四皓”隐居之地不止一处,则完全可能^⑯。(二)“商山四皓”在后代与其说是一组历史人物,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,后来的人们一面使用这个文化符号,一面也在用自己的想象建构这个符号。比如,“四皓”何时和因何隐居,在《史记》中,“四皓”亲口对刘邦说:“陛下轻士善骂,臣等义不受辱,故恐而亡匿。”^⑰《汉书》既从而因袭之^⑱,却又谓:“此四人者,当秦之世,避而入商雒深山。”^⑲避秦还是避汉,这之间的参差可不算小。此外,“四皓”原仅有名号,其姓名汉前著述不载,是在晋人皇甫谧《高士传》、江敞《陈留志》这些书中,完成了为其安排姓名的工作^⑳,所以歧说纷纭,如东园公或姓唐或姓庾,绮里季又叫绮里季夏,夏黄公或姓黄或姓崔,另外,东园公又叫园公,又叫圉公。颜师古讥之为“自相错互,语又不经”^㉑,实亦不足怪矣。至于所谓汉高祖给太子的手敕,“群臣咸称汝友四皓,吾所不能致,而为汝来,为可任大事也”^㉒云云,和张良致“四皓”书“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”^㉓云云,本来就是小说家的踵事增华,更不必较真。当年顾颉刚提出过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的命题,“商山四皓”不过是其中之小而又小者。

“商山四皓”与“南山四皓”长期共存并行,但更为人所知的还是“商山四皓”的说法。所以沈从文看到“近半世纪新出土两件文物”,一是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的竹筐,另一是河南邓县南朝墓中出土的画像砖,上面的两幅“四皓”图旁都有“南山四皓”的题识,就感觉非常新鲜。他初见前一件文物,还怀疑是“商”、“南”形近,乃题识者之笔误。当再见到后一件文物,才敢于肯定“南”字不是误书。这说明传世文献中屡见的“南山四皓”,他可能未曾注意及之,这就难免要影响判断的准确了。比如他说竹筐的年代大致在两汉之交,“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‘南山四皓’的”。但从上述可知,把这四个人叫作“南山四皓”的,何止“那

时”又何必“民间工师”而已！至于他结合画像砖的年代，说“原来史传上的‘商山四皓’，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‘南山四皓’”，就又似乎表明他对那时传世文献中与“南山四皓”并行的“商山四皓”注意得也不够^②。

二

陶渊明《饮酒》其五（结庐在人境）是一首名诗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是其中的名句^③。历代关于这两句诗的争论颇多，但多集中在下句第三字作“见”还是作“望”上^④。到了沈从文的文章出来，又增添了一种饶有趣味的见解。沈从文说：“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，欢喜引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。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，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，不以得失萦怀累心。东篱采菊是实，所见南山也不尽虚。我惭愧读书不多，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，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，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，正可和‘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’发生联系，用事虽不同，立意却相近。原来渊明所说‘南山’，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，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！何以为证？那个画像砖产生的年代，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。”^⑤此见解虽新颖，存在的问题却是明显的，现在让我们来讨论。

“商山四皓”又称“南山四皓”，诚然。但何以陶氏所见之“南山”指的就是“四皓”所隐之南山？何以陶渊明就是想起了那座南山中的“四皓”呢？文章中并没有直接给出解释。夷考陶氏一生行实，其足迹未曾踏及北地，故其“悠然”所“见”者若为实写，则必非北地之商山，是可必也。而凡读陶诗者，实不难判断其为实为虚也。谓其为虚写者，岂不见紧接其后的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二句乎？且由历史上辨为“见”为“望”者之众可知，历代读此诗者亦多解为实写。如苏轼这段有名的评论：“因采菊而见山，境与意会，此句最有妙处。近岁俗本皆作‘望南山’，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。”^⑥又清方东树云：“此但书即目即事，而高致高怀可见。”^⑦王国维云：“写景如此，方为不隔。”^⑧以上“境与意会”、“即目即事”、“写景如此”云云，是其意皆以陶诗所写为实景也。又南宋洪迈云：“渊明诗文率皆纪实，虽寓兴花竹间亦然。《归去来辞》云：‘景翳翳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旋。’其《饮酒》诗二十首中一篇云：‘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。凝霜殄异类，卓然见高枝。连林人不觉，独树众乃奇。’所谓孤松者是已，此意盖以自况也。”^⑨范子烨深韪此说，并“为补充与‘孤松’至为相似之一例”，那就是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诗：“流目视西园，晔晔荣紫葵。于今甚可爱，奈何当复衰。”与《止酒》：“好味止园葵。”谓园葵即西园之葵^⑩。按，渊明诗文是否“率”皆纪实自可再论，但古今学者拈出的二例，证明了渊明诗歌的写实特征，那是无可怀疑的。这对于我们理解“南山”的写实性，也自具有启发意义。

因对陶渊明享年的看法和对诗句的理解不尽一致，古今学者对包括此诗在内的《饮酒》组诗的系年出入颇大^⑪，但无论何种，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都认为作于闲居浔阳故宅时^⑫。按东晋时浔阳故地在今九江市西，庐山正在其南，故论者多谓“南山”即“庐山”^⑬。查陶诗中“南山”凡三见，除《饮酒》其五的本条外，另二条为《归园田居》五首其三：“种豆南山下。”《杂诗》十二首其七：“南山有旧宅。”此外还有《游斜川》提及的“南阜”等，亦均显指庐山，前人亦固已言之矣^⑭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二句前人评论纷如，根据理解深浅的不同，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层。偏于表层者谓其“境与意会”、“即目即事”，已见前引，探其中层者谓其“悠然忘情，趣闲而累远”^⑮、“闲远自得”^⑯，悟入深层者谓其“知道之言”^⑰、“深入理窟”^⑱。而此最后一层，亦有举以解其全诗者。知什么道？入什么理？但凭意会，出语则落第二义矣，但这里仍愿举两则以供读者参考。明郎瑛云：“夫《饮酒》第五首，脍炙人口者也。尝往来胸中，若有所得其好者。夫

以第一句‘结庐在人境’，似静中有动；第二句‘而无车马喧’，似动中有静。三四句‘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’，即心境浑融处也；五句‘采菊东篱下’，是潜心求一；六句‘悠然见南山’，是得一之征矣；七八句‘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’，乃至和充溢，表里盎然；九句‘此中有真意’，所立卓尔；十句‘欲辨已忘言’，正末由也已。可见陶公心次浑然，无少渣滓，所以吐词即理，默契道体，高出诗人，有自哉！”^④清王士禛云：“通章意在‘心远’二字。‘真意’在此，‘忘言’亦在此。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滞，空洞无涯，故所见高远，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，又岂俗物之可妄干。有时而当静境，静也，即动境亦静。境有异而心无异者，远故也。心不滞物，在人境不虞其寂，逢车马不觉其喧。篱有菊则采之，采过则已，吾心无菊。忽悠然而见南山，日夕而见山气之佳，以悦鸟性，与之往还，山花人鸟，偶然相对，一片化机，天真自具，既无名象，不落言诠，其谁辨之？”^⑤人多称陶诗隐居田园之作“平淡冲和，潇洒脱落”^⑥，“天机流畅，静气流溢”^⑦，这首诗就是这类诗的典型代表。所以，鲁迅虽于陶渊明其人持“尚有取舍，即非全人”说，被选来作为与其“金刚怒目式”相对立的“浑身静穆”类代表的，却正是“悠然见南山”这一句^⑧，因为他的理解与常人是同样的：“在东篱下采菊，偶然抬起头来，悠然地见了南山，这是何等自然。”^⑨

三

“四皓”作为一个文化符号，其核心内涵不是一个而是两个，并且是相反的两个，就是肥遁避世和出山辅政。古人多有绾合二者而颂咏之者，如三国魏曹植《商山四皓赞》：“嗟尔四皓，避秦隐形。刘项之争，养志弗营。不应朝聘，保节全贞。应命太子，汉嗣以宁。”^⑩白居易赏识其“出处两逶迤”，表达“天下有道见，无道卷怀之”、“何必长隐逸，何必长济时”^⑪的传统思想。但也有不以为然者，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就针锋相对，讥讽其出处两失宜，所谓“舍大以谋细，虬盘而螭伸”^⑫。晚唐人蔡京《责商山四皓》：“秦末家家思逐鹿，商山四皓独忘机。如何鬓发霜相似，更出深山定是非。”^⑬则转而嘲其不能终隐。这可说是“四皓”接受史中一种特别的声音。“四皓”给予后世更大影响的，似乎又还是其作为隐者的品格。唐李华《四皓赞》：“时浊代危，贤人去之。商洛深山，鸾鹤潜飞。汉以霸兴，皇王道衰。玉帛虽至，先生不归。吾非固然，可动而起。庞眉皓发，来护太子。至尊动容，夺嫡心已。四贤暂屈，天下定矣。返驾南山，白云千里。”^⑭虽然意涉二端，重心却显然落在功成身退、出而终隐。

还有更多纯粹将“四皓”视作隐士而加称颂的文献，如《汉书》将其与之前的伯夷、叔齐和之后的郑子真、严君平等逃世者并举，并谓“自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、郑子真、严君平皆未尝仕，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，近古之逸民也”^⑮。汉光武帝刘秀亦有诏曰：“自古尧有许由、巢父，周有伯夷、叔齐，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。自古圣王皆有异士，非独今也。”^⑯东汉末荀悦：“想伯夷于首阳，省四皓于商山，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。”^⑰三国魏阮璃：“四皓隐南岳，老莱窜河滨。颜回乐陋巷，许由安贱贫。伯夷饿首阳，天下归其仁。何患处贫苦，但当守明真。”^⑱又《后汉书》分逸民为若干类型，其中一类是“或去危以图其安”，唐李贤注：“四皓之类也。”^⑲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如果我们硬要将陶句中的“南山”理解成虚写，南山确指“四皓”所居之“南山”，“见南山”确是想起了“南山四皓”，那么想起的又是“南山四皓”的什么呢？其意又偏在何端呢？

鲁迅说：“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‘田园诗人’、‘山林诗人’，是没有的。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，也是没有的。”^⑳他多次提到陶渊明“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”^㉑，“陶潜正因为并非‘浑身是静穆，所以他伟大’”^㉒。这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宏观把握是正确的，陶渊明的入仕轨迹俱在，他的诗文包括集忧愤孤傲、激昂感慨与闲情高致于一体的《饮酒》组诗俱在，皆能证明

这种对陶渊明的判断也是符合事实的。不过这并不是鲁迅的独得之秘，宋末元初王应麟就说：“陶靖节之《读山海经》、《屈子之赋》、《远游》也。‘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’悲痛之深，可为流涕。”^①清代顾炎武也说：“栗里之征士，淡然若忘于世，而感愤之怀，有时不能自止，而微见其情者，真也。”^②近代龚自珍的诗句则云：“陶潜酷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。莫信诗人竞平淡，二分《采甫》一分《骚》。”^③至于王国维还举过陶渊明的“终日驰车走，不见问所津”，称为“诗人之忧世也”^④。从学术的角度说，这类见解显示了研究者视野的全面和立场的辩证，是其可贵之处。但亦因如此，我们在研究陶诗时就不能一以这类见解为依归。如果这样，这类见解就成为我们全面考察和辩证理解陶诗的障碍了，就和它们体现的精神背道而驰了。宋人黄彻说：“世人论渊明，皆以其专事肥遁，初无康济之念，能知其心者寡也。”^⑤清人谭嗣同说：“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，非无意于世者，世人惟以冲淡目之，失远矣。”^⑥但我们要知道，“皆以其事肥遁”和“惟以冲淡目之”的问题出在“皆”和“惟”，而不出在“事肥遁”和“冲淡”。“事肥遁”和“冲淡”自是陶渊明其人其诗不可否认的另一重要特色，而且，是基本特色。陶渊明一生享寿有六十三、七十六岁等多说，较正式的入仕时间满打满算不过八年^⑦。他临终所说的“寿涉百龄，身慕肥遁”（《自祭文》）既非虚语，梁钟嶸称之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^⑧，则亦可称良有以也。“尝读《高士传》，最嘉陶征君。日耽田园趣，自谓羲皇人。”^⑨唐人孟浩然的这种理解也就不能算不对。至于他少仕多隐的原因，自然有道紊世乱、不偶于时的无可奈何，最根本的还是出于其“质性自然，非矫励所得”（《归去来兮辞序》）的天性和“廉深简洁，贞夷粹温”^⑩的胸襟。然则其诗中多隐逸之作、静穆之篇如《饮酒》其五之类，就不仅是理之所当然，而且必得如此，方可称名实相符。

陶诗中确有明确咏及“四皓”的作品，相对于一百几十首的全部诗作来说，数量还不算少，却无不指向“四皓”高邈绝尘、避隐遁世一点。第一首为《桃花源诗》：“嬴氏乱天纪，贤者避其世。黄绮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。”语意甚明，无庸赘言。第二首为《饮酒》其六：“行止千万端，谁知非与是。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毁誉。三季多此事，达士似不尔。咄咄俗中恶，且当从黄绮。”诗句体现了作者的感愤之心、康济之念、忧生之情，证明了鲁迅的那句话，“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”^⑦。但这些怀抱、念头和心绪竟归于一，就是“且当从黄绮”，所以王叔岷笺证云：“第六首言超然于世俗之是非，自甘退隐也。”^⑧第三首为《赠羊长史》：“路若经商山，为我少踌躇。多谢绮与用，精爽今何如。紫芝谁复采，深谷久应芜。”诗为赠羊松龄衔命出使秦川称贺刘裕破后秦平关中之作，秦川为四皓隐地商山之所在，故诗句道及之。宋吴仁杰谓此数句“与《饮酒》诗‘且当从黄绮’同意。当桓、刘之世，先生不出世，如避秦也”^⑨。可知，即使在送官员出使的时候，一个归园田居者表达的，依然是对异代不同时的另外四位归隐者的礼赞！第四首为《蜡日》：“未能明多少，章山有奇歌。”二句意晦，潘重规、王叔岷认为，章山即商山，奇歌即四皓紫芝歌^⑩。若果属意于紫芝歌^⑪，则自亦属意于隐遁矣。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！陶渊明对于“四皓”确实是心驰神往的，但其心之所属并不在其辅政一点，而在其隐遁一点，就是王叔岷所说的：“商山四皓之隐遁，固陶公所向往者。”^⑫而其所以向往之原因，上引宋人吴仁杰数句既早作出了分析，王叔岷亦云：“四皓处秦、汉易代之交，退隐商山，陶公处晋、宋易代之交，退隐田园。其境遇相似。”^⑬因而，这首被宋人称为“摆落世纷”^⑭、“超然邈出宇宙之外”^⑮的诗，其中的“南山”不应与“四皓”相涉^⑯。果若相涉，其向往于“四皓”者亦决非在其出山辅政，而在其高蹈避世。就是说，不是“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”，而是“想起南山之中的那四位隐居老人”；不是“正可和‘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’发生联系”，而是体现了陶渊明追慕“四皓”、翛然绝尘的心情。

关于“悠然见南山”除文博学家沈从文外，训诂学家徐复又有一种解释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：

“翟汤字道深,寻阳人,笃行纯素,仁让廉洁,不屑世事……司徒王导辟,不就,隐于县界南山。”^①徐复据此谓“见”当作“望”。“望南山,指翟汤言。望谓注仰,有向往义……作‘见’义无可说。”^②此说与沈说一样别开生面,但也与沈说一样全然未作论证。因此,虽然陶渊明的继室出于浔阳翟氏^③,虽然向往隐士比向往辅政与全诗的基调来得相合,结论却同样显得仓促,穿凿不足以服人也。又王瑶释“采菊”二句:“相传服菊可以延年,采菊是为了服食。《诗经》上说‘如南山之寿’,南山是寿考的征象。”^④这些都属于化空灵为质实,变悠远为执著,变理趣为看似有理而其实无趣了,故统不取。清人沈德潜对于陶诗有一种看法:“晋人多尚放达,独渊明有忧勤语,有自任语,有知足语,有悲愤语,有乐天安命语,有物我同得语。”^⑤应当说,晋人放达的外表下也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,沈语于此似稍有未达一间之憾,但他指出陶渊明诗歌内容和情感的多样化,确实是很有见地的。

①⑦ 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2047页,第2047页。

②③⑫⑭⑮⑰⑱⑲⑳㉑㉒ 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677页,第3056页,第1681页,第3056页,第2036页,第3056页,第3056页,第3058页。

④ 赵幼文《曹植集校注》卷一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,第89页。

⑤ 张震泽《扬雄集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,第193页。

⑥ 陈彭年《宋本广韵》,中国书店1982年版,第179页。

⑦ 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九篇上“页部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,第420页。

⑧⑤⑥ 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1208页,第2756页。

⑨ 贺次君《括地志辑校》卷一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7页。

⑩ 程大昌《雍录》卷五,中华书局2002年版,第105页。

⑪ 柳宗元《柳宗元集》卷五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127页。

⑬ 清顾祖禹称商山为“终南之支阜”(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五四《陕西三·西安府下·商洛山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2594页。按:标点者将此句阑入皇甫谧语,似非)是。由此亦可知,西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谓:“南山曰商山,又名地肺(同肺——引者)山,亦谓楚山。”(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3701册,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,第39页)清段玉裁亦谓:“曰蓝田山,曰商洛地肺山,曰终南山,东西相接八百里,实一山也。”(《说文解字注》九篇上“页部”,“南山四颡”条下,第420页)谓诸山为一山,则不甚准确了。终南山与其他诸山的关系,不是异名同指,而是以大涵小。

⑮ 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卷二〇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,第1727页。

⑯ 雷文汉《商州四皓庙四皓墓稽考》,载《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》2006年第1期。

⑳ 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五《四皓名》(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75页),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二三《四皓考》(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348页),《汉书·王贡两龚鲍传序》颜师古注(第3056页)。

㉑㉒ 殷芸《殷芸小说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,卷一第4页,卷二第54页。

㉓㉔ 沈从文《“商山四皓”和“悠然见南山”》《花花朵朵·坛坛罐罐》,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,第88—89页,第89页。

㉕ 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,皆据袁行霈《陶渊明集笺注》,中华书局2003年版。为省篇幅,略去页码。

㉖ 程千帆《陶诗“结庐在人境”篇异文释》,《程千帆选集》下册,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第1229页。

㉗ 苏轼《题渊明饮酒诗后》《东坡题跋》卷二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1590册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28页。

㉘ 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卷四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,第113页。

㉙③③ 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卷上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10页,第6页。

㉚ 洪迈《容斋三笔》卷一二“渊明孤松”《容斋随笔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556页。

㉛ 范子烨《悠然望南山——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·诗人的骋望与还乡》,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,第361页。

㉜ 或谓其作于终隐之前的晋安帝元兴二年(403),见宋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(许逸民辑校《陶渊明年谱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15页),或谓其作于终隐之后的安帝义熙十二三年(416—417),见宋汤汉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卷三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04册,第121页)。王瑶、袁行霈定在义熙十三年(分别见《陶渊明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,第57页;《陶渊明年谱汇考》,《陶渊明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,第353页)。又,邓安生定于义熙十一年(见《陶渊明〈饮酒〉诗作年考辨》,载《天津师院学报》1981年第6期)。

㉝ 其实《饮酒》组诗序开头即云“余闲居寡欢”,已自言明矣。

㉞ 如丁福保《南山指庐山而言》(《陶渊明诗笺注》卷三,上海医学书局1927年版,第13页)傅东华:“南山,指庐

- 山。”(《陶渊明诗》,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,第23页)
- ③⑥ 如杨勇注“种豆南山下”：“渊明所指南山，则是庐山。”(《陶渊明集校笺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60页)逯钦立注“南山有旧宅”：“南山，指庐山。”(《陶渊明集》卷四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19页)古直注“南阜”：“南阜，谓庐山也，凡诗中南岭、南山，亦即庐山。”(《陶靖节诗笺》卷二，上海聚珍书局，1926年版，第4页)
- ③⑦ 晁补之：《题陶渊明诗后》、《无咎题跋》卷一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1565册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页。按“累”字一作“景”，又作“心”。
- ③⑧⑦⑧ 蔡启：《蔡宽夫诗话》，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三引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6页，第16页。
- ③⑨④⑦⑦ 葛立方：《韵语阳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，卷三引苏轼语第43页，卷四第53页，卷四第53页(“摆”字原脱，据周本淳校点《诗话总龟》后集卷二十五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60页)。
- ④① 郎瑛：《七修类稿》卷一六《渊明非诗人》，第238—239页。
- ④② 朱彥辑《古学千金谱》卷一八，清治恕斋藏板，第21页。
- ④③ 归有光：《陶庵记》，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一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426页。
- ④④ 潘德舆：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一〇《清诗话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2152页。
- ④⑤⑤⑦⑦ 鲁迅：《题未定草(六)》、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205页，第213页，第205页。
- ④⑥⑤⑦⑤③ 鲁迅：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《而已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12页，第112页，第112页。
- ④⑦ 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六归入“隐逸”类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649页) 味其所咏，显然包含入世内容。
- ④⑧ 白居易：《答四皓庙》，《白居易集》卷二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4页。
- ④⑨ 元稹：《四皓庙》，《元稹集》卷一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1页。
- ⑤① 《全唐诗》卷四七二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362页。
- ⑤① 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七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327页。
- ⑤③ 袁宏：《后汉纪·光武帝纪卷五》，《两汉纪》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84页。
- ⑤④ 荀悦：《申鉴·杂言下》，《诸子集成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28页。
- ⑤⑤ 阮瑀：《隐士诗》，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魏诗》卷三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381页。
- ⑥① 王应麟：《困学纪闻》卷一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917页。
- ⑥① 顾炎武：《日知录》卷一九“文辞欺人”，黄汝成《日知录集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095页。
- ⑥② 刘逸生：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83页。
- ⑥④ 汤新祥校注《苕溪诗话》卷八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43页。
- ⑥⑤ 谭嗣同：《致刘淞芙书》，《谭嗣同全集》卷三，三联书店1954年版，第379页。
- ⑥⑥ 袁行霈：《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》，《陶渊明研究》，第78—100页。
- ⑥⑦ 陈延杰：《诗品注》卷中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41页。
- ⑥⑧ 孟浩然：《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》，徐鹏《孟浩然集校注》卷一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61页。
- ⑥⑨ 颜延年：《陶征士诔》，《文选》卷五七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791页。
- ⑦①⑦⑤⑦⑥ 王叔岷：《陶渊明诗笺证稿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卷三第296页，卷三第371页，卷三第296页。
- ⑦② 吴仁杰：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义熙十三年条下，《陶渊明年谱》，第20页。
- ⑦③ 分别见潘重规《陶诗析疑》，载《清华学报》1968年新7卷第1期；王叔岷《陶渊明诗笺证稿》，卷三第371页。
- ⑦④ 皇甫谧：《帝王世纪》载：“四皓始皇时隐于商山，作歌曰：‘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。晔晔紫芝，可以疗饥。唐虞世远，吾将何归？’”(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3701册第39页)。
- ⑦⑨ 从“黄绮之商山”、“路若经商山”两句可知，陶渊明凡明确提及四皓隐居之地，均称“商山”而不作“南山”，这也足够成为我们理解“南山”含义之一助。
- ⑧① 《晋书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2445页。
- ⑧① 徐复：《陶渊明集》举正》，《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65页。
- ⑧② 萧统《陶渊明传》：“其妻翟氏，亦能安勤苦，与其同志。”(《陶渊明年谱》，第252页)王质《栗里谱》“太元九年”条：“妻翟氏偕老……当是翟汤家。”(同上，第2页)
- ⑧③ 王瑶注《陶渊明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，第51页。
- ⑧④ 沈德潜：《说诗碎语》，《清诗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532页。

(作者单位 《合肥工业大学学报》编辑部、清华大学中文系)

责任编辑 山木